

第三世界社會工作發展的角色

——社會計畫的展望

James Midgley 著

孫 健 忠 譯

摘 要

今日許多社會工作者對於他們傳統補救性的社會福利工作予以批評。這種批評特別是與開發中國家相關聯，因此有些社會工作者對第三世界的社會工作提出其他扮演角色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社會工作者在開發中國家社會發展計畫上擔任主要的角色，但是這種建議並不切實際。第三世界的社會工作者惟有獲得專業地位的合法性及公眾的認可，同時顯示經由其直接服務，有能力來解決日益嚴重的貧窮問題，否則他們不可能被要求參與國家社會政策的研擬及規劃。

專業社會工作在今日國際上已廣泛的建立，社會工作學院不僅在本世紀初期發展其為專業工作的工業國家中存在，同時在許多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也存在著。受過專業訓練的社會工作者在不同的國家及不同的社會、經濟、政治及文化特性的社會中被任用。雖然社會工作者在不同的國家從事工作，但是他們所扮演的功能大都類似。世界上所有的社會工作者都關切個人的問題，同時應用與案主建立治療關係的技術來處理這些問題。雖然社會工作者主要的對象是個人，但是許多人認為在社會問題的改善上，社會工作的貢獻應是多層面的。社會工作中團體工作及社區組織方法的發展，以及其歷史演進上對社會福利的重視，即顯示出社會工作在社會中確有其他的角色及功能。

社會工作的功能有不同的分類，有些人認為社

會工作具有補救、預防及社會改革的功能(Remedial, Preventive and Social Reform Functions)；某些人則認為社會工作視其不同的方法而有不同的功能，經由不同的方法，社會工作協助個人、團體及社區，甚至整個社會。最近數年中，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工作已被談及另一新的功能，許多人認為第三世界的社會工作不僅應關切到社會問題的補救及預防層面，同時更應在國家的發展及現代化方面作積極的貢獻。

斯坦(Herman Stein)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嘗試提出對社會工作功能有系統及週全的分類。斯坦認為社會工作在任何社會可扮演三種角色及功能。第一種也是最常被提及的就是對體系維護的功能，在大多數已採行社會工作的國家中，社會工作被認為是「經由符合社會價值及制度的方法來滿足人們的需要，以達成社會的穩定及團結」。但是社會工作也關切體系的變遷，經由支持及改革的方法，社會工作可促成漸進的社會變遷。社會工作的第三個功能是發展性的，也就是說社會工作關切到影響多數人福利的社會政策的形成與執行。雖然此三種功能在理論上都是可能的，但是斯坦認為實際上大多數國家的社會工作僅限於體系維護的功能。

斯坦的模式對於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工作有特別參考的價值。社會工作應有的角色在這些國家正被廣泛地討論。近年來，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工作者已逐漸關切到其表面為專業而實際上對於整個社會低度發展的問題沒有關聯。許多社會工作者體認到傳統的方法對於開發中國家的社會需要是極有限的變

響，他們認為傳統的社會工作僅是處理都市貧窮及不良適應等顯性問題，而對於多數人的福利幾乎沒有任何的增進。因此他們開始尋求擴大社會工作專業的角色以更有有效的處理開發中國家多數人需要的問題。他們嘗試將自己容納於整個社會範疇內，也就是希冀達到斯坦所謂的社會工作發展的功能。

第三世界社會工作發展角色的尋求也增強了對開發中國家社會工作教育及社會工作實施的批評，這種批評主要是針對專業本身而言。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工作者對於其依賴西方社會工作理論的現象頗多評論，他們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發中國家許多社會工作學院的建立均採取西方國家發展的課程及結構，同時許多社會工作學院均依靠英國及美國的社會工作教育者的協助而建立，因此導致成為西方社會工作訓練的翻版。如同湯瑪士(P. T. Thomas)以印度為例指出社會工作訓練主要的趨勢均起源及繼續受到美國的影響。這評論對於開發中國家許多社會工作學院的建立是相當正確的。開發中國家的許多社會工作教育者均在西方接受訓練，同時仍繼續在工業國家從事高深研究工作，彼等其實是在工業國家受教育及實習，而甚少接受其他文化國家的特殊訓練。第三世界的許多社會工作者目前深信此種趨勢將更加速對開發中國家不適當訓練方法的轉移。

工業國家對開發中國家課程結構的轉移也導致了方法論的轉移。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工作者執行著適合西方社會原則的社會工作理論於自己國家。許多年來，在英國及美國關於專業社會工作所產生的

觀念、原則及方法被認為適用於所有社會，然而此種信念已被開發中國家的一些社會工作者批判。一九六一年於哥斯大黎加召開的第四屆泛美社會工作會議中，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的與會者對西方社會工作理論運用到他們國家的有效性深表懷疑，他們認為社會工作的原則應該視不同國家的需要而調整。由於此種觀念的萌生，聯合國報告中指出許多學校及教師的組織已慎重地考慮到運用本國的哲學及方法對問題挑戰。此種見解已被第三世界的許多社會工作者認同，同時在一九七二年第十六屆國際社會工作學院聯合會的會議中獲得重視。

開發中國家的許多社會工作者也對西方社會工作的價值觀是否與他們傳統的文化相符合表示懷疑。在夏威夷召開的社會工作價值一致性的討論會上，與會者發現西方社會工作的理論與許多開發中國家人民的傳統價值觀相抵觸。艾莫札(Almason)更特別指出將西方社會工作的觀念如自決、情緒表現及機密性應用到菲律賓社會時執行的困難，菲律賓人民的傳統價值及態度需要引用不同的學說及方法來介入。其他國家的社會工作者也同樣地發現既有的文化特質與信念與西方社會工作專業的價值是相違背的。

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工作者也對他們本身的實際成效感到懷疑。雖然在許多開發中國家專業社會工作者被任用，但是他們對社會的需要僅產生極小的影響，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缺乏適當的資源。僅有少數的開發中國家有政府或志願的社會服務支持專業社會工作者來協助他們的案主。縱然在印度已有

完備的政府及志願福利方案，資源的問題仍然是尖銳的。如同加各那漢(V. Jagannadam)指出社會工作在發展的社會無疑是必要的，但是由於問題的複雜及資源的貧乏，嚴重的限制社會工作者實現此種角色。因此，大多數開發中國家社會工作的實施僅限於提供基本補救性服務，政府任用社會工作者來處理日漸急迫的都市不良適應問題，他們通常在都市地區執行法令的社會福利措施如婦女及兒童、殘障者、精神病患者、乞丐、少年犯罪者及失依兒童的保護。開發中國家的許多社會工作者對他們專業有限的範圍及傳統的角色感到失望，他們認為社會工作對開發中國家社會問題的解決可以產生更積極的貢獻，同時傳統補救性的社會福利服務需重新規劃。

這些對開發中國家社會工作教育及社會工作實施本質的批評反映對社會工作體系維護功能的普遍失望，也反映了目前社會科學內對社會政策及計畫角色發展性思考的認知。

社會工作及發展的社會內容

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工作者已被現代發展理論的新觀念所影響，更由於目前對於國家發展的批評，使得他們對於社會工作傳統角色的失望更增強。今日第三世界的許多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及發展規劃者逐漸的從過去經濟發展理論中覺悟，而這些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對許多開發中國家有決定性政策的理論目前也遭到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開發中國家獲得政治

獨立，他們繁榮的前途在於仿效工業國家的經濟政策。人們相信開發中國家透過金融貸款或外援得到資本，並大量投資生產性工業，因而也他們必須創造利於企業活動及建設性的環境，同時採取措施鼓勵現代國家經濟的成長。人們相信這些策略會帶來快速經濟成長，同時對開發中國家的原始經濟予以轉換，而人們也認為經濟發展會帶來社會發展，也就是說第三世界人們生活的傳統型態會被現代態度與價值所替代，而此種現代行為的出現會進一步帶來經濟發展。快速的經濟成長可以解決第三世界的貧窮問題，當國民所得增加，大眾的生活水準也隨之提高，經由持續的經濟發展，基本的貧窮問題可以獲得解決。

這些基本的見解在討論發展研究的教科書及期刊中均被陳述，同時也在許多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政策及國家發展計畫中反映出來。許多國家吸收外國投資，又有許多國家獲得龐大的國際貸款來從事發展方案，這些經濟政策產生驚人的結果，許多開發中國家均創下極快速經濟成長的紀錄。第三世界許多國家首都繁榮的景象亦甚顯明，高樓大廈、金碧輝煌的旅館、交通的擁擠、進口的消費貨物、西方時髦玩意及一些現代性的表徵均開始呈現。許多開發中國家投資大量的金錢在重工業、現代化機場、水電計畫、規劃新城市與高速公路及增加國防費用，這些投資充分顯示出開發中國家想達到與西方成就一樣的熱望。

由於這些顯著的發展使得一九五〇年代發展的專家對於情勢相當樂觀，但是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末

期，他們的樂觀急遽地消失。鑒於聯合國對於第三世界第一個經濟政策發展二十年方案的實際評估及現代發展策略的遭到批判，許多經濟學家及發展規劃者相信雖然持續的經濟成長及生產工業大量的投資，但是開發中國家的多數人民並沒有比他們二十年前前的富足。

雖然仍有許多樂觀的發展研究學生對此有所辯解，但是有充分的事實顯示出開發中國家的大多數人民生活於貧窮、愚昧、無知、不良的健康及受剝奪的不良環境中。這些令人失望的統計資料在許多學術性的雜誌、書籍、官方報告及國際出版資料中均可發現，其中對於第三世界貧窮的討論報告主要來自聯合國。在一九七〇年關於開發中國家兒童的報告中顯示，每一百個出生兒童有二〇個在一年內死亡，在八〇個活著的兒童中有六〇個在他們的兒童期缺乏醫療照顧，而導致營養不良，這可能使他們日後成爲生理或精神的殘障者。

面對著這些失望的統計資料，發展研究的學生們現在相信經濟成長所帶來的財富並沒有均等的分配。由於缺乏再分配性的社會政策，第三世界中經濟發展的財富都被外國投資者及本國特權階層所據有。一部份事實也顯示出這些財富被耗費於許多奢侈浮華沒有生產性的計畫及不適當的技術投資中。許多經濟學家及發展規劃者目前已瞭解到第三世界中多數貧窮、疾病、無知、失業、沒有住宅等問題並沒有解決，這就是他們今日對傳統發展理論嚴重的批評及企望矯正此種不平衡發展的結果。

爲了尋找使得第三世界多數人民獲得福祉及改

善貧窮與被剝奪等嚴重問題的適當發展政策及策略而激起了發展的研究，也同時在社會政策的研究中產生了新的思潮。許多新的經濟學家及發展規劃者現在認爲開發中國家的問題可說是社會問題，需要透過適當的社會政策來解決。

社會工作者及發展的爭辯

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工作者也被這些發展思潮所影響。某些人相信社會工作專業侷限於處理都市地區的不幸個人是對第三世界社會需要的不適當反應，他們相信這個策略是基於西方社會對需要及社會問題的觀點，這並不能適用於第三世界。某些人體驗到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工作者僅居於發展的邊緣，他們認爲這是相當諷刺的。他們聲稱社會工作者同樣對於社會福利、社會政策及社會正義等課題有特殊的興趣。面對著他們學術領域被侵入的挑戰，許多社會工作者相信他們的專業應參與在適當發展理論的研擬上，同時也應該在促進社會發展上有所貢獻。

席多卡 (S. K. Khinduka) 是這種觀念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在一九七一年一篇重要的論文中，他批評社會工作在個人治療方面傳統及不適當的方法。第三世界的社會問題需要解決，但是與社會工作既定的工作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他以開發中國家社會需要的本質爲討論的開始，他認爲這些國家的社會問題基本上是由於低收入導致的貧窮、被剝奪、文盲、不良的健康、不適當的居住環境及有限

的教育機會。他並沒有提及心理上不良的調適及個人的病態。他對第三世界社會需要的解釋與目前許多發展理論學家強調的重點是一致的，而提出的解決辦法也是類似的。他認為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問題必須透過政府行動及有效的社會計畫與適當的社會政策來解決。他呼籲社會工作在國家發展方面作更大的參與，此可說是對於專業傳統功能的違背。這種呼籲對第三世界的社會工作者而言就是要認同新的活動領域，這與原先的工作對象及角色是絕大的不同。

自從席多卡的論文發表以來，許多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工作者也作了類似的發現及建議，而在不同的會議中對於國家發展中社會工作可能的貢獻亦有討論。許多社會工作者已建議對第三世界社會工作學院的課程予以調整，應包括營養學、家庭計畫、農村社區發展、社會政策及計畫與婦女福利方面的課題。一九七四年社會工作教育者在曼谷召開的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及社會會議中指出「社會工作教育與社會福利相配合以對國家發展目標產生更直接貢獻的觀點已引起國際的關切」。第三世界中社會工作可能扮演的發展角色就是參與社會政策及計畫的研擬，許多社會工作者強調社會工作經由參與社會計畫可對發展的成效有所貢獻，這也是席多卡論文中主要的建議。

社會工作者與社會計畫

集中式的國家計畫是許多開發中國家經濟政策

的主要特徵。許多開發中國家都成立了中央級機構負責國家經濟計畫，企圖以理性為基礎作直接的投資及資源分配。這些機構主要關切經濟計畫方面的事務而對於社會福利的事務極少關注。但是事實逐漸顯示雖然經濟成長，但大多數人民的福利，尤其是農村人口並未深受其惠。許多開發中國家雖然擴大了教育及醫療服務，但是由於集中於都市地區反映了資源的嚴重不良分配。鑒於此，計畫機構開始從事社會區域計畫以達成社會服務資源更合理的分配。社會服務經費的支出不僅基於人道主義，同時也考慮到經濟因素，但是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醫療及教育方面的支出，不應視為一種浪費，而視應為對人力資源的投資，可以改進人口的生產能力及加速經濟發展。總之，社會區域計畫由先前在經濟發展的邊緣而逐漸受到重視，而社會計畫的名詞在社會服務的規劃上也很快的被應用。

到了一九六〇年代的末期，發展理論學家指出了若干社會本質的問題，他們認為這些是發展計畫的中心。貧窮及組織障礙的因素是否阻礙了改良常引起爭辯，而失業及潛在失業的問題也引起了相當大的關注。地域間人民所得不同及多數人民被排除於參與發展的計畫也引起了相當的注意。土地改革、人口成長及倫理衝突等問題也被廣泛地討論。再分配學說已成爲最近發展理論的主要課題。開發中國家社會計畫的範疇因此擴大，如同發展理論學家強調的規劃新途徑，也就是探討社會政策廣大的課題而不侷限於社會區域計畫。聯合國的專家們亦同樣地建議，由於發展規劃最終目的在於社會福祉

及社會正義，因此，經濟計畫與社會計畫不是分離的也是不易區別的。

但是若認為第三世界國家中央計畫機構能從事有效的社會計畫則是過分的樂觀。雖然在發展理論中有新觀念及學說的提出，但是許多發展規劃者都接受自由派經濟的訓練，同時對於社會計畫的需要仍然懷疑。許多政府也同樣的不願意將工業投資的費用轉於社會福利。雖然目前社會計畫的需要獲得肯定，但是許多開發中國家仍僅是分配極少的經費於社會福利方案。由於既得利益團體擁有顯著的政治影響，因此，再分配土地，以及由富者轉移收入及其他資源到貧者的可能性均受到限制。許多開發中國家的中央計畫機構只有很小的權力及地位，而許多也缺乏專家。在許多國家對有效社會計畫所需要的資料及訊息也是不完全的。

這些問題雖然限制了社會計畫者在他們國家產生漸進社會變遷的努力，但是仍獲得了許多進展。目前許多發展計畫考慮到社會政策及計畫的需要以擴大社會福利。許多國家已擴大他們的社會服務，同時也尋求改進服務的範疇及效果。許多發展計畫已強調社會區域計畫的重要性。在一些開發中國家及西方國家的大學內已提供許多訓練的機會予社會計畫者。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目前亦將社會政策及社會福利的問題給予優先考慮，同時資助關於社會計畫者的訓練及研討會。更多的政府已任用社會計畫者來參與國家計畫機構內的工作。

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工作者已顯示對於發展計畫中社會政策及計畫的角色感到極大的興趣。許多社

會工作者極欲擴大他們的角色以包括斯坦坦所謂的發展功能，他們建議開發中國家的政府必須提供給專業訓練的社會工作者在國家計畫中就業的機會，同時也使社會工作者在社會區域計畫的研擬及執行上擔負相當的責任，而且也擴及至所有社會政策及計畫的層面。一九七二年在海牙召開的第十六屆社會工作學院國際會議中，格里瑪（Y. W. Gerima）於演說中強調社會工作者對於社會服務計畫必須擔負特殊的責任，他們也必須完全地參與在國家發展計畫的研擬工作。何肯斯坦特（M. C. Hokenstact）同樣地相信社會工作者能透過社會計畫影響技術及社會變遷，他們不應該僅停留於對社會不良解決的功能上。如同斯坦坦所指出的「社會工作者參與在發展政策的形成及計畫上不但是適當的，而且是必要的」。

雖然開發中國家的許多社會工作者視社會計畫為一種擴大專業興趣及對國家發展貢獻的機會，但是有一些理由可解釋社會工作者為什麼不能填補社會計畫的位置也就是說有許多因素阻礙社會工作者參與及負責社會計畫的構想。

參與社會計畫的障礙

一個主要對開發中國家社會工作者參與社會計畫的障礙在於社會工作的本身。這些年來專業社會工作已經發展其獨有的方法，這些方法指引社會工作者對社會需要的概念及如何解決社會問題。這些方法起源於十九世紀社會工作對個人貧窮的關切。雖然由於許多理論的介入促使此方法更新，但是現

代社會工作仍然停留於對個人問題的關切及解決之道。雖然社會工作者聲稱社會團體工作及社區組織的方法是針對團體及社區，但是這些方法仍是起源於社會個案工作。在義國社會工作領域內，雖然團體工作及社區組織方法已充分的發展，但是個案工作仍是最權威的方法。因此，個案工作可說是社會工作最顯著的特性。何況，在其他國家，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社會工作中的團體工作及社區組織方法仍被忽視。

近些年來，社會工作的方法已被那些認為社會需要唯有透過政府行動及社會政策方能有效解決的人們所攻擊。這個課題是目前社會工作探討的重心，如同在十九世紀初期那般。在那時社會工作的倡導者反對政府在社會事務上的參與。歷年來，社會工作者對此都有不同的意見。雖然有許多社會工作者強調參與國家福利的課題，但是就整體而言並沒有多大的進展。不論在工業國家及開發中國家，社會工作學院的課程極少強調社會政策，而社會工作仍停留於關切個人的問題，而非社會結構的衝突及矛盾，強調的是個案史而非社會的歷史，重點是個人的問題而非社會的課題。

呼籲社會工作對國家社會計畫扮演新的角色與目前社會工作專業的方法是不相吻合的。此觀念代表了一個對原有社會工作專業及角色不同的課題，也對既有的事實挑戰。工業國家中社會工作者同樣的呼籲也遭到攻擊。卜傳（Z. T. Buttram）就曾指出將社會工作重點的轉移即是將社會工作本身的專業置於困惑。

另一個社會工作在開發中國家參與社會計畫的障礙是學科本身的缺乏專業知識。社會工作者目前並不具有複雜計畫工作的技能。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工作學院極少強調社會政策的講授，同時學生們也沒有被教導成為發展規劃者的技巧。這些學校並沒有提供如經濟學、統計學、電腦程式、資料分析、人口學及方法論學科的訓練。

開發中國家社會工作學院缺乏適當社會計畫課程的訓練是可以改進的。最近數年來，美國的社會工作學院已逐漸地對社會計畫觀念感到興趣，他們的專業知識可轉移到第三世界的社會工作訓練機構。雖然此種建議被提出，但是要注意的是在有關社會計畫的文獻中，美國對於社會計畫的觀念並不適用於開發中國家。美國及英國探討社會計畫的文獻中並不關切到國家發展計畫，而是地方服務的計畫與協調，以及社會服務執行機構本身的計畫，這些與發展研究文獻內社會計畫的觀念極少相同。

社會計畫的觀念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國的社會工作界可視為社區組織的延長。社會計畫被視為社區組織的功能，目的在探討社區福利的合理化。社區組織者關切社區福利基金的募集以及地方志願機構與政府社會福利機構的協調。這些社區組織者因他們的工作而接受許多方法的訓練如網絡分析、計畫預算及作業研究等都在美國社會工作學院社區組織課程中教授。學習了這些技術，社區組織者可稱為社會計畫者嘗試於改進地方社會服務措施及提供的水準。

西方社會工作內社會計畫的觀念與開發中國家

的問題是缺少關聯的。在第三世界貧窮與被剝奪等問題是不可能經由地方社區計畫來解決。許多發展規劃者相信這些問題僅能經由政府在國家層次行動上方能有效解決。第三世界貧窮的消滅需要的是政府積極的行動而不是志願機構或社會福利機構零星的工作。加各那漢相信社會工作缺乏專業知識以達成此使命，他認為社會工作不可能以解決個人問題的方法來解決社會嚴重貧窮的問題。

基於此，開發中國家將社會計畫的責任賦予受過發展計畫相關課程訓練的專業計畫者而非社會工作者。雖然社會工作者有將國家社會政策研擬及執行的責任賦予己身的企圖，但是在實際計畫的領域內，他們有限的知識使得他們的願望停留在理想而非實際行動。

另外一個在開發中國家社會工作參與社會計畫的障礙是機會的問題。雖然社會工作者在各種場合要求政府指定專業社會工作者擔任重要政策及計畫的職位，但是極少政府答應此要求，因為這些職位早已被佔有。受過發展研究訓練的專業規劃者通常擔負國家計畫的工作。同時在政府中擔任重要社會政策制訂的官員們也都是有經驗的公務員，他們不僅有能力與政客們溝通，同時具有行政預算及管理方面的知識，雖然他們極少受過社會工作的訓練。社會工作者認為他們會被歡迎甚至邀請來取代那些已參與社會政策規劃及執行的專業規劃者與歷練的行政官員是天真的想法。在印度，專業社會工作已完整建立，可是極少社會工作者參與政府重要層次的政策決定。雖然印度目前有二十所以上的社會工

作學院並訓練社會工作者多年，可是極少被聘用為職位高的社會行政官員或政策制訂官員。許多社會工作者感嘆佔據重要職位擔負社會福利決策的首長們均非社會工作者，這種現象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社會福利行政部門都是事實。

社會工作者認為社會福利行政需要特殊的技巧，但是卻不一定與管理知識相關。席多卡即指出瞭解人性是社會政策及計畫研擬與執行的條件。社會計畫及行政者必須是熱心的、能溝通的、有彈性的及接受人是有缺點的。在一九七一年舉行的人口政策及計畫會議上亦有相同的論調，許多與會者認為社會工作者可以對國家人口計畫行政有積極的貢獻，這不僅因為他們具有人口學、社會學或家庭計畫方面的專業知識，更是因為社會的作者能够傳達人類愛心的信念，同時與案主之間建立尊嚴的關係。

固然從事社會行政工作具備有人性特質是好的，但是在處理發展計畫時的行政經驗與專業知識也是同樣的重要。社會工作者認為他們所具備的人性特質並不能視為他們在計畫領域內具有職位的充分條件。開發中國家的政府不可能以不具有專門知識及經驗的社會工作者來取代那些已具有良好行政經驗的規劃者及行政官員。

雖然目前許多社會工作者認為他們對於低度發展問題的改良缺乏貢獻及依賴西方理論不能增進他們的專業地位，然而他們對這些問題的反應卻是不實際的。社會工作者不尋求重新擬訂這些角色的方法，而尋求上述的方案顯然是過分的雄心及不切實的。

斯坦認為社會工作欲轉移在社會中傳統的功能有賴於許多因素。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社會工作者被社區承認及尊重的程度。社會工作者必須首先能顯示經由其直接服務有解決社會需要的能力，以獲得合法的專業地位及公眾認可。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工作在此方面是失敗的，其失敗的原因在於其服務對象侷限於都市不良適應及社會病態的個人問題，同時他們依賴對開發中國家不適應的西方社會工作的理論與原則，因此在解決問題的貢獻上也是極其有限的。這些問題需要正視而非逃避，社會工作者的角色也必須重新界定而非放棄。傳統僅關切個人病態及治療工作的角色需予以轉換，同時也需要參與在農村貧窮的措施及政策方面。社會工作與西方理論密切結合的現象也必須檢討。雖然第三世界社會工作的特質可能因此有些轉換，但是社會工作者的發現經由提供更適當的服務，對他們而言是更有意義的。僅是在矛盾的證據中宣稱社會計畫係屬於社會工作獨有的範疇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譯者畢業於中興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目前在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攻讀博士學位)

註一：本文譯自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第七卷第二期（一九七八年四月）第一七三—一八八頁。有關原文附註部分予以省略。又承著者告稱行文中第三世界與開發中國家通用，並沒有嚴謹的區分。

註二：Dr. James Midgley 目前為倫敦大學政經學院社會科學及行政系的講師，負責開發中國家社會政策及計畫的講授。